日本1991年清史研究概况

杨 帆编译

一、清代(1840年以前)

1991年日本的清史研究，涉及各个方面，以下分别略作介绍。

地域社会 常建华《中国近年来的明清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6，茂木敏夫译)，介绍并考察了1986年下半年至1990年期间中国学术界有关明清时代社会史研究的状况。中国自解放以后，社会史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至八十年代，才深切感到社会史研究的必要性，并开始对知识阶层以及宗教、宗族等问题进行考察。其中，在宗族制度方面，宗教经济的研究成效很大，在士大夫的研究方面，则以与乡绅，商人有关问题的成果较多。在研究方法上，也由以往单一的阶级分析方法，转而注意利用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松田吉郎《广东省南海县沙头堡之卢氏》(《纪要》，〈兵库教大〉11)，以珠江三角洲桑园围基内的沙头堡为例，指出这些堡(行政单位)的管理运作，实际上是由那些被称作绅士或绅耆的地主阶层所支配的，卢氏即为绅耆的代表。卢氏家族于宋代移居南海县，其中水南乡一支自明代分立，出了不少科举中式者及生员。乾隆年间，成为清朝生员并离堡外出的卢氏与崔氏发生争执。作者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卢崔之间的问题，是由被称作公局的地方组织来解决的。山田贤《"绅粮"考》(《东洋史研究》50－2)，研究的是与松田吉郎同一方面的问题，并进一步论及了地方行政的管理效能。文章考察了清代四川地方精英人物"绅粮"的形成过程，指出在决定地方行政的重要问题时，他们作为被州县政府公请"集议"的参议人员，参与了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的"公局"的活动。作者认为，"公局"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清中叶以后，相对稳定的行政、财政系统与现实日益增长的行政服务需要之间存在着差距。山田贤的另一篇文章《中国移民社会地域秩序的形成》(《亚洲史问题》)，以四川地方士绅为例，考察了明清时期移民社会由同乡集团到同族集团至宗族集团的组合演变过程。山本进《清代四川的地域经济》(《史学杂志》100－12)，以清代四川的棉花流通为依据，描绘了自主流通与依赖全国市场体系的流通之间的对抗关系，并批判了无视这种对抗关系的观点。三木聪《沙县》(《史朋》24)，把清代福建抗租斗争出现的背景上溯至明末邓茂七起义，揭示了其根据地沙县的社会变迁。沙县是福建最大的市场流通圈，作者考察了这个市场圈的构成情况，认为它是由域内的商人和域外的农民构成的。这与上述山本进研究的是同一类型的问题，本文则是把市场圈与抗租斗争联系起来加以论述的。唐文基《明清时代福州地方典卖文书的研究》(《东洋学报》72－1、2，鹤见尚弘译)，考察了福建土地典卖文书中的卖契和典契，认为二者的界限是不明确的，它们既可用在宗族、亲族内部，也可用在非亲族、非宗族之间。斋藤史范《明清时代福建的农家经营》(《明代史研究》19)，揭示了明清时期福建地区农家经营的状况，指出当地因农田数量不足造成米谷供不应求，不得不依赖南直隶、浙江、广东各省和内陆诸县，为了购进米谷，农民纷纷从事甘蔗、烟草种植以及砂糖制造等业。森正夫《〈寇变纪〉的世界》(《研究论集》，〈名大·文〉史学37)，通过追索李世熊对明末清初宁化县"寇"、"贼"的把握，考察了士子对地域社会组织系统的有关认识，并对否定地方官府统治及其社会秩序的作为个人或集团的

寇、贼的活动情况进行了探讨。该文的特点在于它是通过与寇、贼处在对立地位的士子的眼光来分析当时的反抗活动的。臼井佐知子《徽州商人及其网络体系》(《中国——社会与文化》6)，考察了明中叶至清代乾隆年间徽州商人的活动，指出明成化至弘治年间盐的专卖法改为直接在产地交纳银两的方式，是造成徽州商人在明末得以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的原因。该文还涉及到了明清时期商人与专卖制、流通与货币体制的有关问题。夫马进《清代的恤嫠会和清节堂》(《研究纪要》,〈京大·文〉30),着眼于清代全国各地善会、善堂即恤嫠会和清节堂的设立问题，认为它们起源于明末的同善会，并指出恤嫠会自清代中期在苏州首先出现后，就相继普及到很多城市，而清节堂的设立则十分有限。

财政　经济　足立启二《清代前期的国家和钱》(《东洋史研究》49－4)，在把握明清时期由钱经济向银经济转变这一钱流通扩大过程的同时，考察了伴随钱法解体而出现的极度混乱的状况。文章认为，明代后期，制钱已具备作为流通手段的功能，但清初因为私销造成制钱锐减而出现钱贵现象。至乾隆时期，制钱通行全国。从制钱的复活可以看到全国市场粮食、棉花、大豆的流通状况。黑田明伸《清代银钱二币制的构成及其瓦解》(《社会经济史学》57－2)，认为清代银钱二币制是排斥本位货币的币制，具有把本地流通货币和地方结算分割开来的作用。文章还以十九世纪末的钱荒为背景，考察了银钱二币制随着币制改革的进行而瓦解的过程。香坂昌纪《清代中期的杭州和商品流通》(《东洋史研究》50－1)，分析了杭州北新关的常关税功能，考察了米、麦、豆等货物免税以及船料征收等问题，指出由于关差、家属、胥吏以及关役等人对税款的侵吞，户部几乎得不到关税收入。山本进《清代嘉道时期的海运政策》(《东洋学报》72－3、4)，以天津地区大豆、米等粮食作物的运输为重点，考察了嘉道时期的漕运由河运转为海运，民间流通逐渐加入国家流通系统的状况。松浦章《清代芜湖市场和民船》(《文学论集》,〈关西大〉40－2)，以清代芜湖市场的形成为背景，探讨了以长江为首的水路航运与民船的密切关系，并考察了与芜湖商品市场发展密切相关的由明初至清光绪年间设立的抽分所、钞关及商人会馆等机构情形。宫奇洋一《清代前期的煤炭业》(《史学杂志》100－7)，围绕清前期的开矿政策，探讨了矿山的开采、封禁以及有关开采地点、条件的激烈论争，指出其结果导致乾隆五年清政府的开矿政策发生变化，在矿产物中，煤炭率先允许全国民间自行开采，但仍保持着强烈的官营色彩。川胜守《十六十七世纪中国水稻种类、品种的特点及其地域性》(《东洋史论集》,〈九大〉19)，根据地方志考察了十六、十七世纪水稻种类及品种的有关问题，并论述了水稻种类、品种的地域性及其作为商品作物的特性。

政治　黄一农《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中国——社会与文化》6,伊东贵之译)，分析了清初最大的教案"康熙历狱"以及争论的过程，指出很多研究把杨光先与耶稣会士汤若望、南怀仁在天文历算方面的争论当作这次事件的重点，而实际上争论的焦点在于荣亲王葬期的选择这一政治事件。片山兵卫《清代中期的皇子教育》(铃木健一编著《亚洲教育史研究的基础课题》，近畿大学教育研究所)，以乾隆至道光朝为中心，考察了与雍正、乾隆以后实行的皇太子秘密立储制度密切相关的从事皇子教育的师傅以及教育的实际情形。

中外关系　澁谷浩一《中俄关系和洛连茨·郎格》(《东洋学报》72－3、4)，根据十八世纪初参与中俄两国交涉的俄国官员洛连茨·郎格的日记，考察了俄国官员眼中有关清代官僚的问题。夫马进《闵鼎重〈燕行日记〉中王秀才问答的有关问题》(《民族问题》)，分析了十七世纪朝鲜使臣闵鼎重与河北省生员王秀才交往的笔谈记录，并把其中有关中国的情况与《李朝实录》相比较，认为闵的记载与朝鲜流传的人们对康熙皇帝的一般看法大不相同。

民族 岩井茂树《乾隆时期的大蒙古包宴》(《民族问题》),考察了乾隆时期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的大蒙古包宴的情形,指出这是清朝政府用以款待与清朝有藩属和朝贡关系的部族首领和属国君长的场所,也是对待虽未结盟但也服属者的一种礼仪。神户辉夫《清代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政策》(《民族问题》),着重叙述了鄂尔泰的政策措施,认为清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沿袭了明代的土司制度,雍正时期,则以西南各省为中心,进一步推行了改土归流政策。作者的另一篇文章《鄂尔泰与云南》(《史学论丛》,〈别府〉21),认为改土归流政策废除了土司的苛捐杂税,也解除了少数民族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把少数民族重新纳入了封建体制。

宗教 野口铁郎《中国宗教的"正统"和"异端"》(《中国史的正统和异端》),在对明清时期的异端宗教白莲教的研究中,阐述了根据明太祖的国家祭祀政策,与国家权力一体化的祭祀与被祭诸神规定为正祀、在此范围之外的祭祀则一律视为淫祀或异端的情况。小岛毅《正祠和淫祠》(《纪要》,〈东大·东洋文化研〉114),认为从国家祭祠的体系来看,确定正祠的思想依据与明太祖时期的国家政策及其作为思想支柱的朱子学密切相关。作者根据明清地方志有关赐额、赐号的记载,考察了正祠和淫祠的区别。滨岛敦俊《江南刘姓神杂考》(《待兼山论丛》24),通过江南刘姓神,考察了明清时期民间信仰的有关问题,认为民间信仰与文化变迁同样,也反映出民众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经济结构的特点。长谷部幽蹊《明清佛教特点研究》(《纪要》,〈爱知学院大·禅研〉18、19),论述了明清时期佛教的有关问题。

学术思想 张显清《明清实学思潮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明代史研究》19,浅井纪译),认为明清实学思潮兴起于明代中叶,在明末清初达到发展的高峰,延至清代中叶。这是一股反对空疏,讲求实学的思想潮流。作者指出,西学东渐对实学思想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冈本《乾隆禁书(一)》(《纪要》,〈东大·东洋文化研〉115),分析了乾隆时期遭禁书籍的作者群,特别是其中的实学派人士,指出他们提倡的"实用"、"致用"的观点与欧洲学术相近,并且他们很快认识到明代末年王朝生存的危机,从而努力探求对付被视为最大敌人的满族的对策。上述两篇论文在对实学概念的界定上颇有疑问。张文中,政治思想与实学的关系不甚清晰,在时间上实学思潮究竟止于清中期抑或清末也有疑问。冈本文则在论述的细密上颇有说服力,但把明末清初的思想归结为华夷观,则显得简单化了。班吉明·艾尔曼《作为再生产装置的明清科举制》(《思想》810,秦玲子译),通过科举制思想因素内在变动的分析,揭示了其社会的政治的意义。文章考察了担负科举官僚阶层的商人和乡绅精英的关系,认为他们处于文化以及学问世界的中心。但遗憾的是,作者未能深入论述科举制与实学、经世学的相互联系。伊东贵之《"理"的恢复(上)》(《中国哲学研究》3),在对清代思想史中有关吕留良的认识进行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存在着过分强调吕留良民族主义一面的倾向,他作为地方士人和注重经世的朱子学者的一面,也应该受到重视。加藤昌弘《北京香山正白旗》(《纪要》,〈法政大·教养〉人文科学 78),指出《天府广记》作为北京香山正白旗的传说资料,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素材之一。

在学术思想方面的研究中,要考察明末清初的思想,研究那些出现在这一时期并给予后世以巨大影响的思想家,是很有必要的。就此而言,去年有关王夫之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本间次彦《内部性的权利》(《中国——社会与文化》6),是关于布拉茨库《王夫之哲学思想中的人类与自然》一文的评论,指出该文把王夫之的思想与唯物辩证法和有机自然观区别开来,认为王夫之的世界观自有其"内部性"的领域,这一研究从总体上开拓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路。黑坂满辉《王夫之"人性论"考》(《纪要》,〈福井大·教育〉39),探讨了王夫之的思想,认为

在王夫之的传统思想体系中．通过对宋学各种问题及概念的重新认识、分析、批判和修正，显示出其独特的创见。贾茨库·吉尔姆《历史的阅读方法》（《东方学》82，明神洋译），指出王夫之对历史的认识有其独到之处，他总结的有关历史和人类社会的经验，无论现在抑或将来都具有参考价值。斋藤祯《王夫之的“华夷”思想》（《文学会志》，〈山口大〉41），认为王夫之的华夷论不仅仅基于其反清的民族主义观念，而是他全部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重要一环。

二、近代

地域社会 江夏由树《清末奉天省地主制的再形成》（《亚洲史问题》，史学会编），以锦州官庄为例．探讨了清末奉天地方官庄被民间出售．从而形成新的土地所有者及其地主制的有关问题，认为曾任庄头的汉人、旗人因无力购买土地而日趋败落，与此同时，购买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则确定了其地位，并作为当地的权势人物，在地方社会的政治影响力也相应增强。文章还指出了农民由山东省登州府移居此地的途径。小峰和夫《满洲：起源、殖民、霸权》（御茶水书房），是关于满洲地方史的专论。文章论述了东北地区自女真族通过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崛起至清朝勃兴，又经过清政府的封禁政策，至近代纳入世界市场范围的过程。

财政 经济 冈本隆司《关于洋关的设立》（《东洋史研究》50－1），分析了五口通商以后江海关征税机构的变迁以及清朝政府和英国当局的动向，论述了洋关设立的契机及其过程。曾田三郎《清末“商战”论的展开与商务局的设置》（《亚洲研究》38－1），考察了“新政”期间清政府商部的设置至具有法律依据的中国商人团体商会成立之前的历史情形。铃木智夫《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立过程（一）》（《纪要》，〈岐阜药科大·教养〉3），就洋务运动期间“官督商办”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从开办到投产中间费时一二年的原因，提出了与一般说法不同的意见。栗原悟《清末民初云南的交易圈和输送网》（《东洋史研究》50－1），指出云南交易圈由多处地区交易网络连接而成，各种物资均通过各地马帮各自的势力范围中转并输送。松田吉郎《合垦组织“金广福”》（《台湾史研究》9），考察了十九世纪三十至八十年代台湾新竹县合垦组织“金广福”的情形，认为林爽文起义之后，台湾高山族与广东、福建人的矛盾激化，而“金广福”，则是清朝政府用以缓和矛盾的政策手段之一。

政治 菊池秀明《“金田团营”的前夜》（《近代中国研究汇报》13），通过对广西桂平县紫荆山的实地调查．从移民与开发史的角度，叙述了拜上帝会产生发展及其活动的社会背景的具体状况。佐佐木正哉《漫谈太平天国起义与湖南乡勇》（《近代中国》22），考察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湖南乡勇的经费问题。今井骏《对近代四川省鸦片种植史的考察》（《人文论集》，〈静冈大〉41）和目黑克彦《清代末年有关禁烟运动的记录（二）》（《研究报告》，爱知教大社会科学40），是关于鸦片问题的专论。片冈一忠《清朝新疆统治研究》（雄山阁出版），着眼于清末边疆危机，考察了清朝政府面对列强的侵略，在新疆建省以与内地一体化措施的有关问题。细见和弘《清末两江地区的海防问题》（《现代中国》65），从军费筹措的角度，考察了当地的海防问题。森悦子《袁世凯与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史窗》48），考察了处于义和团、清政府以及列强之间的袁世凯对待义和团的态度，指出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主张“义和拳”的根本目的不仅在仇教，而且在抗官，袁世凯根据这一看法，从而反对把义和团改为团练。

宗教 武内房司《清末四川的宗教运动》（《研究年报》，〈学习院大·文〉37），认为清代末年扶鸾等降神仪式与王朝本来的民众教化手段宣讲相结合，成为抗粮暴动等民众运动不可缺少的媒介．特别是宗教结社采用扶鸾仪式，有利于调合各阶层的宗教感情，也适应了当时地域

社会的状况。铁山博《清末四川仇教运动的展开与守旧派官绅的指导(上、下)》(《论集》,鹿儿岛经济大〉31－4,32－1),以义和团以前的教案为例,论述了清代末年四川地区反帝仇教运动的有关问题,并对官绅在运动中的作用作了说明。

学术思想 沟口雄三《中国的民权思想》(板垣雄三编《国家与革命》,岩波书店),从四个方面揭示了近代民权思想的变迁:(1)旨在废除专制体制的反君权思想;(2)随着明末清初以来君主观的变化与地方自治倾向的出现,地方分权向对抗君主权力,促使专制体制解体的方向发展;(3)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亡国、亡种、亡民的危机意识中,随着个人"散沙的自由"被否定,具有整体意识的国民权逐渐形成;(4)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具有反对私欲,舍弃个体,要求平均等特点的民权观念出现。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汲古书院),是自明末清初至近代关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专论汇编。其中《清末经世思想的两大潮流》(《东洋史研究》50－2),认为从魏源开始的公羊经世学,与以曾国藩为起点,推进洋务运动并为汉人官僚所接受的义理经世学(新理学)构成了清末至民初经世思想的两大潮流,经世文编的编纂和废除科举、设立学校等文教政策的实行都与这两大潮流的发展有密切关系。黄依妹《今文学家龚自珍和魏源的佛教信仰》(《东方学》81),就清末今文学家多数信仰佛教或具有佛学素养的问题作了考察。高柳信夫《〈天演论〉再考》(《中国哲学研究》,〈东大·中哲研究会〉3),指出在其译著《天演论》中,严复基本上忠实地反映了为赫胥黎所反对的斯宾塞的思想观点,从而回到了对斯宾塞自身的理解。佐藤一树《严复与梁启超》(《论集》,〈二松学舍大〉34),考察了对清末启蒙思想起过重要作用的严复、梁启超二人在启蒙观、西洋文化观方面的差异。藤谷浩悦《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变革论》(《史镜》22),把戊戌政变前的变革论视为梁启超思想的起点,并论述了其中有关"权"、"群"、"大同"等问题。滨久雄《皮锡瑞的学问与思想》(《纪要》,〈大东文化大〉人文科学29),探讨了湖南公羊学者皮锡瑞学问及思想的有关问题。小林武《章炳麟的历史叙述》(《东方学》82),围绕章炳麟的历史叙述,从叙述形式、史料运用方法、对历史的哲学考察,以及章氏的社会认识等四个方面作了考察。末冈宏《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章炳麟经学》(《日本中国学会报》43),把章炳麟经学中与政治思想有关的内容与变法派的公羊学加以对比,论述了章太炎经学的特点及其春秋学在经学史上的位置。

中外关系 滨下武志《从白银的流通看世界经济网络》(川北稔编《世界的构造》,岩波书店),考察了十六世纪以降,白银成为世界通用货币以后大量流入亚洲境内的状况。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国白银的吸引力与朝贡贸易之关系》(滨下武志、川胜平太编《亚洲交易圈与日本工业化:1500－1900》),指出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欧洲对亚洲境内以朝贡贸易为轴心的贸易活动尚未过分参与,而日本的近代化、工业化则在朝贡贸易中产生,认为日本面对开关后中国商人压倒优势地位所作的对抗,成为日本选择工业化道路的动机。宫田道昭《近代亚洲贸易与中国沿海市场圈》(《思想》810),认为与其说十九世纪末以来新的"亚洲之间的贸易"中断,不如说由于明清政府开关以后长期存在的以江南为中心的中国沿海市场圈的解体和十九世纪末以后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制的形成,造成了全新的亚洲间的贸易体制。田中正美《马儒翰与鸦片战争》(《纪要》,〈爱知学院大·文〉20),分析了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之子马儒翰在鸦片战争至南京条约订立期间所起的作用,指出其依靠宣讲师、外交官以及鸦片商人的多重身分,协助英国政府签订了条约。佐佐木正哉《南京条约的签订及其以后的有关问题》(《近代中国》22),是其《鸦片战争研究》的续编,文章叙述了璞鼎查到达广东后至南京条约签字期间与中国政府的交涉经过。西里喜行《琉球问题与清代报刊(资料篇Ⅰ)》(《纪

要》，〈琉球大·教育〉38－1)，介绍了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清代《申报》》、《循环日报》、《万国公报》、《益闻录》等代表性报刊对琉球问题的记载和评论。

在中外关系的研究中，涉及中日关系的论文较多。王晓秋《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小岛晋治监译，东方书店），论述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同时也探讨了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的影响。严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岩波书店），以具体事例揭示了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赴日留学生的状况以及他们的感受和思考。细野浩二《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史的起点及范围》(《史滴》12)，论述了甲午战争前少数在日留学生的有关问题。汪向荣《清政府雇佣的日本人》（竹内实监译、朝日新闻社），叙述了在中国的日本教习的有关情形。杜石然《中日近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研究报告》，〈东北大·日本文化研〉27)，从科技史的角度，对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作了比较和探讨。细野浩二《中国和日本面对"西方冲击"的态度(上)》（《纪要》，〈早大·院·文学研究科〉哲学、史学 36)，探讨了国际法规范、观念原则的接受以及中日两国对此不同的反映等问题。菅野正《义和团运动后的福建和日本》(《奈良史学》8)，探讨了厦门事件以后福建和日本的关系问题。大泽博明《天津条约体制的形成与崩溃：1885－1894(一)(二)》（《社会科学研究》，〈东大·社会科学研〉43－3、4)，考察了 1885 年后日本新的对外政策体系"天津条约体制"的变迁与崩溃，并涉及到清朝政府特别是李鸿章对英、俄及朝鲜的政策诸问题。

1991 年是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内外都召开了几次学术讨论会，具体成果要到 1992 年以后才能反映出来。仅《在近代》编辑了一期特集，收录了野泽丰《辛亥革命与日本外交》等文章。该文指出，日本方面单纯把南北议和的结果视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是肤浅的，由于中国的革命没有成功，使日本增加了对中国的轻视感，制约了此后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影响到当时日本对袁世凯的看法。文章对目前袁世凯研究由于离不开"道德的判断"而停滞不前的状况表示忧虑，因而提出不仅要探讨中国变革的根源，而且还要探讨日本轻视亚洲、轻视中国的根源，为此，把握辛亥革命的整体构成是十分必要的。

【说明】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 101 编第 5 号《1991 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其中中国的明·清部分和近代部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系由大谷敏夫和茂木敏夫分别撰写。考虑到清史研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因而分别从中摘译出有关清史的内容，仍分为"清"与"近代"两部分，以存原貌。